

数字乡村战略下大学生归乡择业的多元影响因素深度探究

尤悦¹ 武艺²

1.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 河北 承德 067000

2.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体育学院 河北 承德 067000

摘要: 本文综合运用劳动力迁移理论、社会认知职业理论以及乡村振兴理论, 搭建起“宏观-中观-微观”的分析架构。从政策扶持、乡村数字领域发展契机、家乡数字乡村建设程度、区域社会资本及文化氛围、个人职业价值观念、数字素养与技能掌握情况、风险感知及应对能力等多方面, 全面探究政策、区域、个体三个层面变量对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产生的协同影响与制约作用, 为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引进人才提供实证依据。

关键词: 数字乡村战略; 大学生就业; 归乡择业

1 引言

数字赋能成国家战略核心驱动力, 2022年相关计划出台, 数字乡村建设进入关键期, 但人才短缺问题凸显。中国农业大学预测, 到2025年农村电商人才缺口大, 复合型人才不足5%。同时, 高校毕业生就业有结构性矛盾, 乡村新职业涌现却人才难求。城乡人才流动呈单向输出, 数字基建与人才储备不匹配。大学生是数字乡村建设理想生力军, 但乡村籍大学生归乡择业比例低, 多集中于传统公职岗位, 供需错配制约发展, 厘清影响其归乡因素具紧迫性。

2 理论基础

2.1 劳动力迁移理论(推拉理论)

唐纳德·博格(Donald J. Bogue)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推拉理论, 核心观点是劳动力迁移行为受“推力”与“拉力”共同作用: 迁出地的不利因素形成推力, 迁入地的有利因素形成拉力。在数字乡村语境下, 这一理论得到了新的拓展。城市的“推力”不仅包括传统的就业竞争激烈、生活成本高, 还新增了数字职业内卷, 如互联网行业加班文化、创新空间压缩等。乡村的“拉力”则突破了传统的乡情纽带, 延伸至数字乡村带来的新机遇, 如政策扶持的创业补贴、数字基础设施支撑的灵活办公、乡村数字产业的蓝海市场等^[1]。同时, 数字技术弱化了地理距离对信息获取的限制, 使大学生能更便捷地感知乡村“拉力”。但也可能因数字鸿沟(如乡村数字服务不完善)形成新的隐性推力, 需要在分析中纳入动态平衡视角。

2.2 职业选择理论(社会认知职业理论)

伦特(Lent)、布朗(Brown)等学者提出的社会认知职业理论(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 SCCT), 强调个体职业选择是“个人特质-环境因素-职业目标”交互

作用的结果, 其中自我效能感(对自身能力的信念)、结果期望(对职业回报的预期)是核心中介变量。该理论为解析大学生归乡择业决策提供了微观视角: 当大学生通过政策宣传、案例观摩感知到数字乡村领域的职业价值时, 会形成积极的结果期望; 若其数字技能与乡村岗位需求匹配度高, 则自我效能感增强, 进而强化归乡择业意愿。反之, 若个体认为自身能力难以适应乡村数字工作, 或预期乡村职业发展空间有限, 则可能放弃这一选择。

2.3 乡村振兴理论(人才振兴维度)

乡村振兴理论强调“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协同推进, 其中人才振兴是核心动力。总书记指出, “乡村振兴, 关键在人、关键在干”。数字乡村作为乡村振兴的数字引擎, 其落地效果直接取决于人才质量。该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政策与实践的连接点: 一方面, 人才振兴要求大学生归乡择业需服务于乡村数字转型的实际需求, 避免为就业而就业的盲目性; 另一方面, 数字乡村的产业升级(如智慧农业提质增效)又能为人才提供施展空间, 形成“人才回流—产业发展—更多人才吸引”的良性循环。研究需立足这一逻辑, 分析如何通过优化影响因素, 实现人才供给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精准对接。

3 数字乡村战略下大学生归乡择业的多元影响因素分析框架

3.1 宏观层面: 数字乡村战略带来的外部环境影响

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源于数字乡村战略的顶层设计与国家政策导向, 其作用机制可通过劳动力迁移理论中的推拉模型解释: 国家战略通过塑造乡村“拉力”与缓解城市“推力”, 为大学生归乡提供基础性条件。战略实施的广度与深度直接决定乡村对大学生的基础吸引力。

3.1.1 政策支持因素

政策支持作为数字乡村战略落地的核心保障，是引导大学生归乡的重要指挥棒，其设计逻辑契合乡村振兴理论中“人才振兴需政策先行”的核心主张。具体涵盖三个维度：（1）政策供给强度：国家及地方政府针对数字乡村领域出台的专项政策数量与覆盖范围^[2]。政策越聚焦电商、智慧农业等数字产业，越能精准对接大学生的职业需求，形成政策信号的明确指引。（2）政策激励力度：包括资金支持、服务保障、发展平台等。例如，浙江省部分示范县提供的50万元数字创业贷款，通过降低经济门槛强化乡村“拉力”，呼应劳动力迁移理论中“迁入地收益提升”的核心要素。（3）政策执行效能：政策从文件到落地的转化效率。低效执行会导致政策利好沦为纸上福利，削弱大学生对乡村发展的信任感，这也印证了乡村振兴理论中“政策实效决定人才留存”的实践逻辑。

3.1.2 乡村数字发展机遇

数字乡村战略的核心目标是激活乡村的数字生产力，其释放的机遇信号通过劳动力迁移理论中的“预期收益差”影响大学生职业判断，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1）数字基础设施完善度：乡村光纤网络、5G基站、冷链物流等硬件条件，为大学生开展直播带货等数字职业提供基础支撑，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带来的机会不平等。

（2）数字产业岗位供给：乡村电商、农业物联网等领域的岗位数量与质量，其与大学生技能的匹配度直接影响职业前景预期，符合社会认知职业理论中“结果期望决定选择”的机制。（3）数字创新生态活力：乡村数字创业孵化平台、产学研合作及成功案例，通过示范效应增强大学生对乡村职业成长空间的信心，形成“可见机遇—选择意愿”的正向循环。

3.2 中观层面：区域与社群环境的影响

中观层面聚焦区域与社群环境，其作用机制可通过劳动力迁移理论中的“中间障碍因素”与社会认知职业理论中的“环境互动”逻辑解释：区域数字发展差异与社群支持度决定宏观政策与个体选择之间的传导效率，直接影响大学生归乡后的融入质量。

3.2.1 家乡数字乡村建设水平

家乡数字乡村建设的成熟度是大学生归乡后获得感的直接来源，其发展水平需契合乡村振兴理论中“数字基建与产业需求匹配”的要求，具体包括三个部分：

（1）数字产业基础厚度：本地特色数字产业链与数字企业规模。产业基础越厚，大学生就业或创业的土壤越肥沃，这与社会认知职业理论中“环境资源支持强化自我

效能感”的机制一致。（2）乡村治理数字化程度：“互联网+政务服务”覆盖范围与村级数字平台应用深度，通过降低行政沟通成本提升大学生对乡村工作环境的认同，缓解“中间障碍”带来的融入压力^[3]。（3）数字公共服务普惠性：乡村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服务的可及性，通过缩小城乡生活质量差距，解决返乡即失能的顾虑，呼应劳动力迁移理论中“迁入地生活成本与便利度”的影响因素。家乡的数字建设水平是宏观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即使国家战略推进迅速，若家乡建设滞后，仍难以形成有效吸引力。

3.2.2 区域社会资本与文化环境

社会资本与文化环境构成大学生归乡后的软环境，其作用机制深度融合社会认知职业理论中“社会支持影响结果期望”与劳动力迁移理论中“情感纽带弱化迁移成本”的逻辑，包含三个方面：（1）乡土情感联结强度：研究显示，成长于数字乡村试点村的大学生归乡意愿更高，印证情感因素可强化乡村“拉力”。（2）社群支持网络密度：家庭对数字职业的理解度、乡贤提供的资源对接，通过资源赋能提升大学生对职业成功的预期，符合社会认知职业理论中“社会支持增强自我效能感”的机制。（3）地方文化包容度：社会对大学生归乡的舆论导向与对数字职业失败的宽容度，鼓励大学生在乡村数字领域大胆尝试，减少社会偏见带来的障碍。社会与文化因素通过情感支撑与资源赋能，弥补乡村在经济或硬件上的不足，形成“硬实力+软实力”的协同吸引力。

3.3 微观层面：大学生个体特质与能力的影响

微观层面因素是大学生归乡择业决策的内在驱动，其作用机制可通过社会认知职业理论中“个人特质—环境互动—职业目标”的逻辑链解释：个体特质与数字乡村需求的匹配度，决定战略机遇能否转化为个人职业成功。

3.3.1 个人职业价值观

职业价值观是个体对职业目标的优先级排序，在数字乡村背景下的新特征直接呼应乡村振兴理论中“人才价值与社会价值融合”的导向：（1）价值认同维度：对数字技术改造乡村的社会价值认可度、认同度越高，越能从乡村数字职业中获得成就感，符合社会认知职业理论中“结果期望正向影响选择意愿”的机制。（2）发展期望维度：数字乡村的“蓝海属性”吸引追求快速成长的大学生，体现“职业目标与环境机遇匹配”的核心逻辑。（3）风险偏好维度：对不确定性的接受程度，乡村数字产业的探索性特征更适合风险偏好较高的大学生，这与劳动力迁移理论中“个体风险偏好影响迁移决策”的观点一致。职业价值观决定了大学生是否将数字乡村

职业视为理想选择,而非无奈之举,是长期坚守的核心动力。

3.3.2 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

数字素养是大学生在乡村数字领域立足的硬通货,其作用机制契合社会认知职业理论中“能力匹配度提升自我效能感”的核心主张:(1)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包括基础技能(如短视频拍摄)与专业技能(如农业物联网设备调试),印证“能力与岗位匹配”是职业成功的基础。(2)数字信息甄别能力:在海量乡村信息中筛选有效内容、识别风险的能力,能降低职业决策失误率,强化自身能力可应对环境挑战的信念^[4]。(3)数字创新转化能力:将城市数字经验与乡村实际结合的创新力,体现个体能动性适配乡村特殊性的关键作用,呼应乡村振兴理论中“人才需扎根乡土”的要求。数字素养不足会导致想归乡却融不进数字产业,而高素养者能充分利用数字乡村的后发优势,创造独特价值。

3.3.3 风险感知与应对能力

乡村数字职业的不确定性要求大学生具备相应风险应对素养,其机制融合社会认知职业理论中“风险评估影响自我效能感”与劳动力迁移理论中“风险感知调节迁移决策”的逻辑:(1)风险认知清晰度:对乡村数字产业潜在风险的预判,提前通过数字乡村实习了解风险的大学生职业稳定性更高,印证“信息对称降低决策不确定性”的作用。(2)资源整合能力:调动内外部资源应对风险的能力,通过抱团发展提升抗风险能力,强化“环境支持可依托”的信念。(3)心理韧性水平:面对挫折的抗压与调整能力,乡村数字职业试错成本较高,心理韧性是长期坚持的关键,符合“个体特质缓冲环境压力”的理论逻辑。个体的风险应对能力决定了其在数字乡村领域的生存概率,也是将外部机遇转化为实际职业成果的核心保障。

3.4 各因素间的交互作用机制

宏观、中观、微观因素通过协同或制约形成动态影响系统,其互动逻辑深度融合三大理论的核心观点。

3.4.1 政策-产业-个体的正向循环

宏观政策扶持激活中观数字产业,产业发展吸引具备数字技能的大学生归乡,个体成功反哺产业并优化政策,形成“政策拉力—产业推力—个体动力”的闭环,呼应乡村振兴理论中“人才与产业协同发展”的逻辑。

3.4.2 数字鸿沟的连锁反应

宏观数字基建不足制约中观产业发展,即使个体素养高也难以发挥价值;反之,个体技能不足会导致政策落地效果打折。这种数字鸿沟贯穿于宏观、中观、微观各层面,制约大学生归乡择业的积极性与持续性。

结语

数字乡村战略下,大学生归乡择业受宏观政策、中观环境、微观个体多层次因素共同作用。为提升其归乡意愿,需多管齐下:强化政策支持,确保红利惠及;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提升岗位供给与质量;提升家乡数字建设水平,增强获得感;构建社会支持网络,降低心理成本;培养数字素养与技能,增强自我效能感;提升风险应对能力,确保长期坚守。如此,可形成“政策拉力—产业推力—个体动力”的正向循环,激活乡村人才,缓解就业压力,推动数字乡村战略深入实施。

参考文献

- [1]陈阳.数字技术要走进乡村,也要贴近三农——访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黄季焜[J].中国测绘,2022(07):14-17.
- [2]李竞涵,刘知宜.电商赋能三农,不能只盯着“买多少,卖多少”[N].农民日报,2022-01-27(008).
- [3]潘春玲.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人才队伍支撑[N].光明日报,2024-02-20
- [4]徐进.青年返乡创业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J/OL].光明网,2025-06-25.